

激流勇进

——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

刘益涛 著

坚持抗战

毛泽东

中共党史出版社

激流勇进

——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

刘益涛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激流勇进
刘益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流勇进: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刘益涛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199—284—9

I. 激… II. 刘… III. 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日战争—研究
IV. A84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489 号

书 名:激流勇进——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

作 者:刘益涛

责任编辑:王 畅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A5

字 数:330 千字

印 张:12. 75

印 数:1—3500 册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284—9/K · 221

定 价:28.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前 言

毛泽东是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的战争实践活动是他不平凡的一生中最光辉、最成功的一部分；他的军事著述，在他的恢弘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军事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点之一，也可以说是精髓部分。因此，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绝对离不开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理论。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理论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和系统总结的时期。这时毛泽东军事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个别问题和个别论点，而是形成了具有科学形态的军事理论体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精力用于对人民军队作战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对战争理论的深入研究上，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脱离了经验的蝉壳，上升为科学理论，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军事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抗日民族战争的实践，逐步发展确立起来的。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军事理论，也可以说就是毛泽东抗战理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开始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反而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红军发动多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先后取得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由于

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的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并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使全党全军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真正成为全党军事工作的指导原则，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推行灭亡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继而进行了抗日反蒋的东征战役。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它阐述的虽然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但是它创造性地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对于战争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却有一般的指导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基础，无疑地它也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此前后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包含着丰富军事内容的重要哲学著作。在此基础上，为贯彻党的洛川会议的决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实现正规军和运动战向游击军和游击战的转变，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名著，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作战原则，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持久战及进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渡过敌后抗日根

据地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大力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充分发挥军队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职能，广泛开展大生产和精兵简政等运动，创造了一整套人民军队建设的新鲜经验。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总结抗日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问题，全面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概括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个基本内容。这一系列军事著述，不仅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问题，而且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以及关于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理论原则。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在延安时期已经完全形成和建立起来了。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同时经过毛泽东的抗战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抗战理论。军事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它来自战争实践，离开战争实践就不可能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军事理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①1962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②这就表明，延安时期毛泽东抗战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

整系统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实践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有如下特点:

其一,这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是在总结以往革命战争的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说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是指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 and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土地革命战争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教训。经过比较,全党克服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因为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有可能在纠正错误,发扬成绩的基础上,总结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形成科学的军事理论体系。

其二,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民族战争同国内战争比较,敌我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大大拓展了战争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开阔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创造的视野。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为毛泽东抗战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实践土壤,从而使毛泽东抗战理论,不仅影响到国民党军队及全体抗战国民,成为抗击日寇的科学理论指南,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三,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军队领导机关有了比较相对稳定的环境,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部队有了比较多的作战空隙,这就为全党全军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党独立自主地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就包括毛泽东抗战军事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总结。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延安时期抗战理论与实践,不仅是就理论学理论,就战争学战争,更是为了学习和掌握其中的科学的方法论和

辩证法,这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经说:“在20世纪30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毛泽东所制定的这套战略。”^①这就是说,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不仅指导抗日战争赢得了胜利,而且指导以后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也取得了胜利。由此说明,毛泽东抗战理论所包含的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和辩证法,不仅对我们在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的建设,特别是在高科技条件下建军和作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马列主义学说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优势和成功的钥匙,这个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本书想从毛泽东抗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两方面,从史与论的结合上,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延安时期毛泽东深邃的军事思想和超群的军事谋略、战争指挥艺术。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做的,但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能够符合上述的要求。

^① 《毛泽东军事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617页。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军事理论与实践	1
----------------------------	---

第一节 “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的确立	2
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全国抗战形势	2
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	6
三、瓦窑堡会议和抗战基本战略方针的确立	8

第二节 东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一次军事实践	15
一、东征战役之前的奠基礼	15
二、东征战略方针的形成	19
三、东征战役的经过	25

第三节 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时期的军事理论	33
一、正确认识战争的唯物主义战争观	36
二、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	40
三、直接对日作战的抗战准备论	48

第二章 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形成与

实施 54

第一节 平、津失陷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提出 55

一、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和第一次红军参战方案 56

二、云阳改编和第二次红军参战方案 60

三、平、津失陷和第三次红军参战方案 61

第二节 洛川会议和党内对游击战战略方针的

争论 64

第三节 最初实施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三步分兵 79

一、八路军第一步分兵——展开于敌之侧后 80

二、八路军第二步分兵——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 84

三、八路军第三步分兵——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88

第四节 新四军东进北上,依据河湖港汊发展

游击战争 96

一、独立自主组建新四军 96

二、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 100

第三章 全面抗战的战争实践 106

第一节 平型关战役 107

第二节 忻口会战 113

第三节 徐州会战 123

第四节 武汉保卫战 130

第五节 百团大战 138

第六节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143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 144

二、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 148

三、从日本东条英机上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153

第四章 抗战军事理论的完整形成	159
第一节 关于战争问题的理论研究	160
一、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160
二、钻研孙武的《孙子兵法》	165
三、集体研讨,集体著述	168
第二节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71
一、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确立	176
二、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	177
第三节 持久战理论的系统化	184
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188
二、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和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195
第四节 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	199
一、关于战争问题	200
二、关于国共两党的战争史	202
三、关于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共共产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203
四、关于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205
 第五章 抗战中的反顽斗争及其军事策略和行动原则	 207
第一节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209
一、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反顽斗争	211
二、反对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	218
三、制止国民党军对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攻	226
第二节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228
第三节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250

第四节 反顽斗争的理论总结	259
一、反顽斗争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260
二、反顽斗争的策略总方针	264
三、反顽斗争的军事原则	270

第六章 坚持抗战,加强人民军队的

建设

第一节 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276
一、政治上的领导	282
二、思想上的领导	283
三、组织上的领导	284
第二节 建立强有力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287
第三节 进行军队的整顿和整训	303
一、思想上的整顿——延安整风	303
二、组织上的整顿——精兵简政	311
三、两次较大规模的军队整训	318
第四节 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	323
第五节 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334

第七章 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向日军展开局部反攻	344
一、把敌人挤出去	349
二、发展河南,绥毂中原	350
三、组织南下支队进行南征	352
四、开辟苏浙解放区	358
五、准备夺取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	360

第二节 在党的七大上对抗战军事理论的系统

总结 363

一、抗战八年 363

二、论解放区战场 368

三、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 374

第三节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379

附录：民族危难关头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刘益涛

访谈录 387

主要参考文献 391

后 记 394

第一章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 军事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便开始了延安时期。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历了直罗镇战役、瓦窑堡会议、东征、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统战关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山城堡战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并著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重要的军事著作。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所以这时期毛泽东的军事实践与理论全部为着“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

第一节 “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的确立

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全国抗战形势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前后,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开始发动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战争。1932年1月,为扩大侵略战争,转移国际视线,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稳定阵脚后,又将魔爪逐渐伸向华北。1933年5月,日本政府又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实际上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和热河占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日本政府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为实现这一企图,日军于1935年发动了“华北事变”,先后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新的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实际上包括把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继之,日本采取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政治上制造分裂的方法,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实行由它控制的所谓“特殊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1935年11月国民党行政冀东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竟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使冀察两省变成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日本统治地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并在抗日和内战问题上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于1931年11月在对顾维钧就任

外长的训词中,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政策。1932年12月14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会议上对这一政策给以更详尽的阐述,他说:“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我们自己不欺侮自己,无论哪一个外国,都不能欺侮我国,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作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①蒋介石视日本侵略为切肤之痛,视中国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所以必先除心腹之患后治切肤之痛。由于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不顾,对内大肆用兵,先后对江西中央苏区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严重削弱了抗日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可乘之机,使得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如果不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侵略军绝不会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东北并侵入关内,这一点,连日本侵略者自己也很清楚。当年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如果中国的抗日力量集结起来,“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②

虽然蒋介石一再强调“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客观上改变不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生存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外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

^①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矛盾也降到次要地位。

在民族危亡到紧急关头，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的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妥协的斗争更加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指使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学生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受到军警的突然袭击，很多学生受伤或被捕。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并迅速扩展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使中国人民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增强了奋起救亡的信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已经出现抗日反蒋的趋向，另一部分也在抗日和卖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时虽然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他们分别代表英美日等国的利益，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时候，英美派同亲日派之间就加剧了明争暗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马占山、李杜等人为代表的东北军爱国官兵，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对入侵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同年12月，有中国共产党工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宣布反蒋，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行列。1933年5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方振武等在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等的策动下，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方为前敌总司令，吉为前敌总指挥，部队迅速发展到了8万人。1933年11月，曾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自动率部抵抗过日本进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联合国民党左派李济